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铁流

Ж Е Л Е З Н Ы Й П О Т О К

A. C. Серафимович

[苏] 绥拉菲莫维奇 著

曹靖华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铁流

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
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苏] 绥拉菲莫维奇 著

曹靖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流 / (苏) 绥拉菲莫维奇著 ; 曹靖华译.
— 合肥 : 黄山书社 , 2014. 11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ISBN 978-7-5461-4807-6

I . ①铁… II . ①绥… ②曹… III . ①长篇小说 - 苏联 IV .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6017 号

铁流
TIELIU

[苏] 绥拉菲莫维奇 著 曹靖华 译

出品人 任耕耘
总策划 王亚非
执行策划 任耕耘 杨 雯
编辑统筹 马 磊 金 浩
责任编辑 高 杨
责任校对 卓 篁
装帧设计 齐 娜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70 千
印 张 15.75
书 号 ISBN 978-7-5461-4807-6
定 价 2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 (<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 0551-63533725

经典的力量 一生的滋养

王亚非

今天的精英，当年读什么？

读的是热血，读的是精神，读的是民族，读的是修养。

个人需要梦想，民族需要阅读，国家需要富强，一代又一代人需要辉煌。

缺失梦想，个人将浑浑噩噩；丧失阅读，民族将缺乏精神。

有梦想必有情怀，我们的情怀是国家繁荣、民族振兴、一代一代人的幸福与崛起。

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构筑往往来自经典文学作品承载的人性光辉和价值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血梦想和青春记忆，青年时代的文学情怀往往影响我们一生，滋养出辽阔的精神世界，甚至决定着人生的方向。

经典是什么？经典是书中之书，有哲理，有梦想，有力量，有情怀。哪一个人年轻时，不是“文青”；哪一个人年轻时，没有读过经典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奠定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即便在今天，经典仍然是种精神的催化剂，是热血之源。一代一代都需要热血，因为血总是热的，热血沸腾才会有热度、有事业、有创造。我们这一代，今天的新一代，同样都生活在滚烫的时代，拼搏着滚烫的事业，都有一颗滚烫的心。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代人，生在红旗下，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动荡，赶上了恢复高考，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现在很多都成为国家栋梁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引领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峥嵘岁月，他们历经沧桑而壮志不改，梦想炽热。这与他们青年时代的阅读和追求密不可分。

俄罗斯文学经典曾经是中国那一代人年轻时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从《战争与和平》到《铁流》，从《安娜·卡列尼娜》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深深吸引着一颗颗年轻而燃烧的心。其中塑造的很多人物形象，成为这些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内蕴的情感涵养了他们的文化情怀和生活品位；承载的价值理念，内化成他们毕生坚守和追求的人生理想。他们曾经最热血的梦想是像夏伯阳那样跃马挥刀，驰骋疆场；最美的青春记忆永远是手风琴伴奏下喀秋莎的动人旋律和旋转裙裾。

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这就是有尊严的人生所需要的文学滋养。

那一代人，几乎走过一样的路。那真是一段梦想质朴、青春热血的黄金岁月，一代人的阅读、一代文学青年的丰盈精神，成就这个大时代里最蓬勃的社会推动力，源头正是那些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闪耀着的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光辉。

2014年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对于索契这座城市，习近平第一印象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这部小说就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休养时创作的。对于俄罗斯文学，习近平在专访中还提到了很多俄语作家的名字：“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俄罗斯文学。他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在托尔斯泰的三部曲中，他更喜欢《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文学经典为何有这么强烈的感召力？或许因为其壮阔的时代背景，激昂向上的民族精神；抑或源于其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默默奉献的人性

光辉。中国与俄罗斯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面积辽阔的大国，人民勤劳而富有奋斗精神，都有反抗法西斯侵略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曾经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民族之间容易引起共鸣。

当代年轻人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经典？

重温经典，感受那波澜壮阔岁月里涌动的高尚的人文情怀和朴素的情感，提高自身文学修养。读什么书决定你走什么路，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的基础是年轻时代的文学修养决定的。没有文学情怀和积淀，就没有生活价值观，很多成功的人都有很深厚的文学修养。

汲取正能量，坚守梦想，实现自己人生的辉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始终不放弃远大的理想、纯洁的人品、坚定的信念，这种可贵的精神在苏俄经典文学里体现得非常充分。多读读这些书，才知道青年时代的黄金时光是多么美好而短暂，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才算有意义，从而不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和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希望能向当代的年轻人推荐自己一生难忘的十部俄罗斯文学经典，让迷惘而焦虑的你，在喧嚣的环境里，尽情阅读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小说，从中汲取生命的维生素，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难忘的情愫和感动。

“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精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春潮——屠格涅夫爱情小说选》、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和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叶·伊琳娜的《古丽雅的道路》等十册图书。内容主题多元，思想内涵丰富，翻译语言精准，非常值得大家好好读读。

总序：重温往日恋人的情书



俄罗斯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俄罗斯人自认为他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认为俄罗斯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答案很可能是一致的：就是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演讲时曾说：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俄罗斯文学的崛起，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针对俄罗斯的轻蔑、责难和声讨方才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他甚至把这个“转折点”精确地定位在1881年，即《安娜·卡列尼娜》的面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和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的落成等事件的集中发生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翻译家大会上，巴格诺院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而言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她几乎就是我们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的唯一正面因素。”

自普希金始，19世纪的俄罗斯终于跻身世界文学大国，其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座高峰，推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开现代派文学之先河，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各地，造就出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跨语种文学大师，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墙里墙外同时开花，高尔基和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不同身份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始终是俄罗斯最拿

得出手的国家名片。从此俄罗斯文化中也出现了所谓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即文学不仅在各文化艺术门类中独占鳌头，而且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厚的文学。在俄罗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则被奉为“生活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是所谓的“审美的乌托邦”，因之也就成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俄罗斯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俄罗斯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可以说，俄罗斯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始终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和良心的声音。

在中国，文学读者中恐怕很少有人没有读过俄国文学作品，初通文墨的普通百姓对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名字也不陌生，说俄国文学在中国家喻户晓或许并非言过其实。鲁迅所言的“中俄文字之交”源远流长，第一篇汉译俄国作品《俄人寓言》于1872年在上海见报，被收入本套丛书的《上尉的女儿》（又译《大尉的女儿》）则是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俄国小说，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为1903年。历时百余年的中国俄罗斯文学接受史，对于中国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

影响。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启蒙思想、德国马克思主义一同被视为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都是俄罗斯文学的宣传者，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茅盾、巴金等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推广人。鲁迅称俄罗斯文学是“偷运给奴隶的军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更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形成了所谓的“俄苏情结”。无数中国人迷恋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他们能背诵普希金的诗歌，喜欢看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怀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当时，大量中国读者与苏联读者同步地阅读着每一部苏联文学新作，很多人甚至能用俄语阅读原著。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在经历近二十年的停滞之后又迎来一个“井喷”时期，成千上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或新译或再版，一大批中国作家的创作中也烙上了俄罗斯文学风格的鲜明印记。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似有所下降，这既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处境和嬗变相关，也与我们自身阅读趣味和审美取向的转变相关。比如，当代俄罗斯文学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解构趋势，俄罗斯后现代文学浓厚的文体实验色彩，再者，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大传统中，当今的俄罗斯作家似乎更热衷于发扬光大后一种传统，所有这一切都还有待赢得中国读者的理解和呼应。但是，中国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未停止，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十余年来，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年大约都有中译本二十余种，无论是俄罗斯当今文坛的老作家如拉斯普京、马卡宁等，还是文坛新人如普里列平、叶里扎罗夫等，甚至俄罗斯“处女作奖”的获奖者

们；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新潮的后现代文学如佩列文、索罗金等人的作品；无论是“国家奖”、“布克奖”、“大书奖”等俄罗斯当今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还是散见于俄罗斯各文学杂志或文学合集中的“小众”作品，都纷纷赢得了与中国文学读者见面、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可以说，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关注和喜爱俄罗斯文学的中国读者，追踪并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心中是有一幅清晰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全景图的。

然而，我们常常听到读者说，当代俄罗斯文学读来远不如之前的俄罗斯文学那么亲切。任何文学阅读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阅读语境又受制于时代和社会氛围、文学潮流和美学时尚以及阅读者的年龄和经历等多种因素。心怀旧情面对新对象，或将新潮的心态诉诸老去的人与事，往往难免隔阂。但以怀旧的心境打开尘封的往事，则不失为一种聪明而又合理的举动。黄山书社此次推出这套“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在藏典的书柜里挑出几册旧书，新瓶老酒，仿佛能让人闻见岁月酿造出的醇香。如若说，面对新译的俄罗斯当代作品，我们就像在手机屏幕上浏览新识朋友的微信，那么，翻阅这里的十本新印旧书，我们则像在夜半台灯下捧读往日恋人的情书。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
2014年8月18日于京西近山居

《铁流》潜行中国记（代译序一）*

在国民党反动派虐杀文化的暴政下，《铁流》之在中国，是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磨难的。当它还未在中国出现前，就“先天地”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1930年上半年的时候，上海神州国光社约鲁迅先生编一套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鲁迅先生应约拟定了十种，名为“现代文艺丛书”。《铁流》就是其中之一。定后鲁迅先生就写信到列宁格勒约我担任翻译。我答应了。可是不久“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神州国光社也来声明，愿意将旧约作废，已经交去的当然收下，但尚未开手或译得不多的其余六种，却千万勿再进行了。那么，怎么办呢？去问译者，都说，可以的。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所以，是可以的。于是就废了约……然而停止翻译的事，我们却独独没有通知靖华。……待到攒凑成功的时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异从前了：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鲁迅：《〈铁流〉编校后记》）

结果，鲁迅先生就亲自拿出一千现洋，用一个“三闲书屋”的名义，印了三部书，那就是《毁灭》《铁流》与《士敏土之图》。这是《铁流》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开端。出版的时期大约在1931年11月。一出版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三闲书屋”本是徒具其名，实际是不存在的。这一年，在黑暗势力的横压下，通过日本人在上海开的内山书店，将第一版的一千册，一点一滴地渗透到读者中间去。稍后，北平书商盗印翻版之风甚炽，《铁流》

* 标题为编者所加。

也是被翻印之一，但只要能流得通，这也是好的。可惜翻版本一印出就遭到没收。大约到了1933年吧，上海光华书局将《铁流》纸型借去又印了一版，一出版又遭到严禁。这样就一直冻结到1938年。从此《铁流》就由断断续续的“潜流”而进入到长期地“断流”了。

在抗日战争炮火中，生活书店西安分店负责人商议重印《铁流》。我答应了。1938年3月我在西安写的《重版〈铁流〉后记》中说：

拙译《铁流》，经秋白同志译序及鲁迅先生校印，跨过了无限阻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于1931年同中国读者见面后，中间虽经北平书商及上海光华书局的翻印，然因种种关系，终于没有普及到广大读者面前。此外，苏联远东国家出版局（在伯力）虽然也根据我的译稿于1932年出了一版，但那主要是在供给苏联境内的中文读者的需要，因邮路隔绝，这版本之流入中国的，据我所知，也不过数册而已。曾记得1933年从海参崴到天津的一位不相识的同船人，在船要开入大沽口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行李仔细“整理”了一番，将所带的唯一的一本书——苏联版的中文《铁流》，拿在手里，靠着栏杆、翻了几翻，沉默地，决然地把它扔到海里了。

近年来，读者们都很盼望这类书的重印，但是不可能。我所仅有的一本三闲书屋版的《铁流》，于“一二·九”时，被中国大学的一位同学借去，周流了中国大学之后，静静地流到燕大，流到清华，后来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令人窒息的时代，读者要想读一本有意义的书也是不可能的。

这样不快的时光过去了，《铁流》终于在全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炮火里同读者见面了！……

实际上，这样“令人窒息的时代”以及“不快的时光”，当时并没有“过去”，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虽猛，但并没有使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的《铁流》解冻。这是为什么呢？我在上述的《后记》中写道：

它，《铁流》，这是被践踏者争取自由解放的光芒万丈的火炬。我们看这一群乌合之众，在白党的凶残地屠杀下，带着女人、孩子的难民，穿着破烂的衣服，光着脚，一个人只有三颗子弹，有一大半简直只有一枝空枪，这样原始的、“亚洲式”的军队，在血的教训中，在不能形容的艰苦中，粉碎了敌人的铁的重围，沿途扫荡了现代化装备的劲敌，打下了全副武装的城池。甚至母亲举起孩子，跛子拿起拐杖，老头子、老太婆……都抓起马料、车杆、斧子、扫帚，击退了哥萨克骑兵的夜袭。这并非神话，这是绝望地求生的斗争！这是要：

“消灭敌人，为的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

在这样残酷的斗争里，他们埋葬了自己的苦难，建立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在今天，在全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抗战的炮火里，《铁流》的重版，无疑地具有巨大的文学和政治的意义。它将成为争取自由解放的教科书，教育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去怎样消灭敌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它将成为不可遏止的铁的激流，流到前方，流到后方，流到被敌人侵占的区域，流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去鼓舞千千万万的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斗争！我们要：

“消灭敌人，为的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

这是我们的求生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就是怕人民解放，怕人民得到自由，怕人民翻身，《铁流》也就恰恰成了反动统治者的眼中钉。它于1938年7月再度出版后，就又处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棺材盖子似的重压下了。可是究竟是抗战时期，那禁压的手法，在表面上同以往是有所不同的。以往是普遍地明令严禁，这时是明开暗禁，都门之外禁，都门之内不禁。这是为了“壮国际观瞻”，替纸糊的民主贴点金，是于国民党反动派有益的缘故。

可是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索性连“国际观瞻”也不“壮”了。那是一阵冰雹，气温骤然下降。战时首都成了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大集中营，随时都有被集体坑陷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就根本停了摆。这是不禁之禁。但这套相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是大煞风景的。这一阵冰雹过去，表面又好似放松了一步。但实际却是外弛内张。对出版控制的手段，更其严密、毒辣而且流氓。当时控制出版的花样，举不胜举，其重要者如：

一、强化审查：某些东西或全部不能印，或部分地删削，有时删削得体的无完肤，面目全非，上下不接，读来不知所云。不但删削，检查官还可以任意涂改原稿，甚至替外国作家改文章——随心所欲，乱改译稿。有时竟至改得与原意完全相反。这简直成了恶作剧。译稿送审时，必需附送原本，否则不收。这样，凡失掉原本的战前译本，就无法重版。

二、控制印刷机构：当局当时把控制印刷机构，作为控制文化的手段之一。用刮来的民脂民膏，强制收买私人的印刷器材及印刷机构，迫使进步书刊无处印行。

三、怂恿印刷工人搞“阶级斗争”：官方印刷厂把印刷工人的工资特别提高，同时怂恿资金薄弱、而且得不到官方平价米的苟延残喘、朝不保夕的民营印刷机构的工人，向资方要求增加工资，向官家印刷厂工资标准看齐，企图借此一箭双雕地压倒进步的民营印刷机构，进而扼杀进步文化。国民党

反动派自己当时把这种方式称作“阶级斗争”式，含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嘲弄主张阶级斗争学说的意思。

四、纸张控制：当时当局除掌握规模较大的造纸厂外，对民营纸厂所产纸张，亦强制限价收购。其限价常低于成本。通过纸张控制来控制进步文化。在强制限价收购下，官家的反动书店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胜利出版社、拔提书店等等，几乎用无代价的纸张，大量印造反动书刊，而进步书店却被迫只得用高价到黑市购纸印书。当局企图使这些“异己”书店，在成本高压下自行倒闭。

五、营业税：当局也利用营业税作为压垮进步书店的手法之一。当时重庆的进步出版者、文化工作者，都曾为此奔走呼号，奋起抗议。

六、文化站：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后方控制了交通工具，进步书刊出版后，由一地运往另一地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而伪军委会政治部却利用特权，组织了“文化站”，分站好像蛛网似的密布了国统区。当时重庆两路口社会服务处的阅览室内，有一大幅全国分站图，载得很详细。这文化站的任务有二：一是利用自己的优越的交通条件，将反动书刊迅速而大量运到穷乡僻壤；二是步步为营地检查、扣留、销毁进步书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有同样的“文化驿站”的组织。当时重庆出现的由数十家组成的联营书店，就是在这些致命的打击下，合力图存的产物。这是进步文化事业单位在无可奈何中，用来对抗当局的一种办法。

七、邮检暗扣：在战时重庆，当局有时为了“国际观瞻”，对于文化的控制，讲“策略”，讲“技巧”，所以对进步作家不采取捕杀，对进步书店不采取封闭，对进步书刊不采取明令禁止的方式。除上述诸法之外，并采用扒手方式，即邮检暗扣。派特务常驻邮局检查，遇该没收者，人不知鬼不觉地没收完事。而且对外绝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寄件者寄出了，而收件者却永

远收不到，即使挂号也归无用。当时邮件上均盖着一种戳记，说明：“凡遇不可抗之损失，本局概不负责”。所谓“不可抗”者，主要也就是指这一点而言的。

八、通令密禁：进步书刊透过上述的天罗地网，在战时首都的市区以内，照理总可通行无阻了。其实不然。凡国立、市立或公立各学校、各机构的图书馆或阅览室的负责人，都是当局思想上的可靠的“自己人”，当局经常有禁书目录发给他们，凡目录中所载者，责令他们严禁购买及陈列。同时并将这些书目分送给官家及中立的民营书店，严禁代售。时有特务到各书店巡视，遇代售禁书，轻则没收，重则严惩。

九、盯梢：国民党反动派用尽一切方法，还难杜绝市区内个别读者对进步书刊的购阅，于是就采取了盯梢办法。这分两种：一是派特务专往特定的若干书店如新华、生活、新知、读书等店内，猎狩顾主。有时当这些特殊人物心情好的时候，还故意给机警的顾主使一个眼色，暗示着到这儿来是不安全的。有时遇他心情坏的时候，他就狠狠地撞你一下，有时跟出门外揍你一顿，痛骂一阵，更有时跟到你的住所，把你的“来历”追出来，把你“记”到“帐”上。另一种是在机关、学校里盯梢，监视个别读者。当时沙坪坝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读者，盛行“择地读书”，就是把“不安全”的书偷偷带到“安全阅览地”去读。嘉陵江岸上和松林坡的林中，一时都成了安全阅书地。宿舍、教室、图书馆反而不能作为阅书的地方了。否则特务就要盯你的梢，“记”你的“帐”，“帐”记到一定程度，你就有“自行失足落水”的危险。“明哲保身”的读者，对这些“是非之书”，固早已敬而远之了。

以上所记，仅个人所记忆的大略而已，至禁例中之苛细，那是不胜枚举的。

将近二十年来，《铁流》也就在这样的天罗地网中，时而“潜流”，时

而“断流”，或则能印的也仅限于正文与注解。如1945年3月25日，我在重庆写的《〈铁流〉后记》中说：“《铁流》现在重印了。但因特殊困难，目前能与读者见面的，也只有正文与卷末的注解，其他如作者给中译本特写的序文，《作者自传》，史铁儿^①的译序，鲁迅先生的《编校后记》以及作者的《我怎么写〈铁流〉的》等文，只有暂付阙如了……”

那时的版本，就是以这样的面貌问世的。

回想起来，《铁流》之在反动统治时代的中国，也真是生不逢辰。它还没有被译完的时候，就“先天地”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出世后就又遭到这样沉重的灾难。可是它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却并不因此而削弱。在当时的国统区，在黑暗的重压下，要是读者一得到它的话，它就以坚强的铁的潜流的姿态，在进步读者中间流开了。而在解放区则更成了浩浩荡荡的铁的洪流。

在抗战末年，林老祖涵同志到了重庆，有一次在一个小规模文艺聚会上，曾对我说道：“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看过这书的。它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

秋白同志也早在1931年12月5日给鲁迅先生的信中说：“《毁灭》《铁流》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胜利。”他并且还认为介绍这些作品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1949年9月26日，作家孙犁同志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苏联文学怎样教育了我们》，一开始就说：

^① 瞿秋白的笔名。